第45卷 第6期
2022年11月

干旱区地理
ARID LAND GEOGRAPHY

Vol. 45 No. 6
Nov. 2022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培育路径研究
——以红色旅游城市为例

张新成[1]， 高 楠[1]， 王琳艳[2]， 李锦敬[1]

（1. 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2. 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选取12个重点红色旅游城市为研究案例，探究了其红色旅游高质量演化特征，并运用多案例的定性比较法和典型案例的网络文本分析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培育路径。结果表明：(1) 案例地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地区差异显著，六大子系统中增长动力、增长结构和增长方式上升水平尤为显著。(2) 案例地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存在极差化特征。具体引致各发展类型失配的障碍系统存在差异，且其主导障碍因素呈现由内部资源优势向外部环境协调转化的过程。(3) 多案例地驱动机制分析可知，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六大子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增长动力是核心因子，增长结构是共生因子，增长方式是非敏感因子，增长形态是敏感因子，增长成果是外部性因子，增长基础是支撑因子。(4) 典型个案的内容分析提炼出了全方位扩大红色旅游的正外部性效应、优化数字经济格局下的红色旅游共生环境、激发红色研学的大众旅游市场需求共三大关键培育路径。

关 键 词：红色旅游；高质量；指标体系；培育路径

文章编号：1000－6060(2022)06－1927－11(1927～1937)

截至2019年底，我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次已超1.4×10^9，总收入超过1.4×10^9元，约占全年旅游总人次的23.33%和总收入的6.03%。《2021红色旅游发展报告》指出，2020年红色旅游人均消费达1287元，红色旅游消费市场对地区经济贡献将达到万亿规模，成为推动革命老区社会经济振兴发展重要动能。红色旅游作为国家认同、政治文明和巩固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于国民认同感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另外，对于扩大国内文化旅游消费，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近年来红色旅游发展存在红色文化传播不足、资源开发同质化、地域特色不鲜明、产品创新不足、区域经济带动作用不强等难题，与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仍存在差距。据此，如何评估红色旅游高质量内容？其中，阻碍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有哪些？未来培育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将为新时期我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国外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红色旅游、战时旅游和黑色旅游等[1-2]，有关红色旅游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中国实践展开[3]，包括遗产保护、传播、认同和政治教育等[4-5]。国内红色旅游研究则聚焦于资源分布、产品开发、服务质量、文化传播和开发模式[6]，针对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内涵探讨研究，如宋昌耀等[7]认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重点要处理好政治主题和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林宝民等[8]、阎友兵等[9]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建设内容的集中体现。许春晓等[10]将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协调共生视为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雷莹等[11]提出红色旅游景区高质量内容包括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资源保护。二是制约因素研究，如吴若山[12]、邓伟等[13]提出体制机制、资源管

收稿日期：2022-03-02； **修订日期**：2022-0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GL141)资助
作者简介：张新成(1992-)，男，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红色旅游及旅游经济运行等方面的研究. E-mail: reddblue123@163.com
通讯作者：高楠(1982-)，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目的地运营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E-mail: gaonan0901@163.com

理、人才建设、科教水平和理论滞后等制约了我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三是提升路径研究，如王雄青等[14]、阳国亮等[15]提出社区参与、业态融合、品牌推广、强化体验等是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可见，已有研究中能够体现出新发展理念内涵和特征的评价指标相对较少。研究对象上缺乏案例聚焦，多以理论层面的探讨为主。研究方法上文本分析、专家访谈等定性研究较多，构建量化模型并测评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鲜少。

基于此，在综合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12个重点红色旅游城市为例，运用定性比较分析和网络文本分析探究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培育路径。本研究全面揭示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部机理与培育路径，旨在厘清新时期我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1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

高质量发展指能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求，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16]。本研究认为创新发展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增长动力，包括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和环境，是增强红色旅游产品开发和新兴业态培育的体现；协调发展是解决红色旅游内部产业发展和外部系统协调问题，是增长结构；绿色发展是通过地区环境治理的持续投入，改善地区红色旅游发展的生态质量，是增长方式；开放发展是扩大地区红色旅游影响力，由“引进来”向兼顾“走出去”转变，是增长形态；共享发展是展现红色旅游发展的公益性和增强民生福祉的重要体现，是增长成果；文旅资源是开展红色旅游活动和传播红色基因的载体，是增长基础(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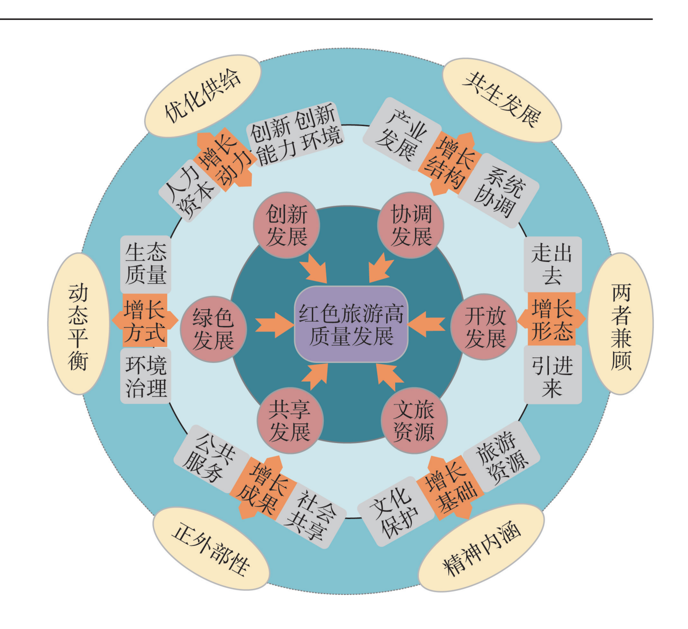


图1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

Fig.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1.2 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尝试通过基于文本的扎根分析方法[17]，通过三级编码细分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各系统层所涵盖的指标层。具体在百度网页、知网、微信公众号上检索关键词为“红色旅游高质量”，通过去除重复样本、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网络文本后共获取2018—2021年共78篇。进一步对所搜集的网络文本进行开放性编码，通过关键词提炼出次范畴，即二级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明确不同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最终提炼出主范畴，即为一级指标(表1)。

1.3 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16年长沙成立的全国红色旅游创新发展城市联盟(表2)，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剔除了省会城市、红色景区等级不高且排名靠后的城市，遴选出了12个城市作为案例地。数据获取途径：一是地市统计资料并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作为补充；二是百度指数，通过关键词检索获取历年数据；三是网络爬取数据。其中，红色培训和举办红色旅游相关学术会议数均来自于百度网站检索获取。红色旅游法律法规获取自北大法宝网站，进行政策力度评分标准综合测算[18]。社交媒体传播指数则获取自微信检索“市名+红色旅游”，将文章阅读量和点赞数分别赋权0.8和0.2进行综合测算；数据结果处理上，对所有数据指标进行标准化换算，通过熵值法[19-21]对指标予以赋权，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1.4 研究方法

1.4.1 健康距离模型 健康距离模型表示系统运行过程中受到外力干扰后与其原始真空运行下的偏离趋势。计算公式如下[16]：

$$\mathrm{HD}(M_1,\ M_2)=\sum_{i=1}^{n}\left|\frac{M_1(x_{bi})-M_2(x_{ai})}{M_2(x_{ai})}\right|\times K_i \qquad (1)$$

表1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Tab. 1　Index system of red touris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度指标(权重)
增长动力	人力资本	人才培育	红色培训数(0.038);每万人旅游专业院校在校学生数(0.042)
		研学教育	举办红色旅游相关学术会议数(0.044);红色文化旅游发文量(0.071)
		从业人员	旅游从业人员比重(0.201)
	创新能力	技术产品	发明专利授权数增速(0.125)
		科研扶持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增速(0.135)
	创新环境	体制机制	红色旅游法律法规指数(0.075);旅游政策法规关注度指数(0.155)
		文化创意	文化创意产业关注度(0.115)
增长结构	产业发展	业态融合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0.131)
		产业集聚	旅游产业集聚度(0.085)
		市场需求	国内旅游人次(0.115);入境游客人次(0.05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111)
	系统协调	城镇化协调	旅游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0.178)
		经济协调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0.101);旅游业增长弹性系数(0.107)
		生态协调	旅游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0.114)
增长方式	生态质量	水生态	工业废水排放量(0.088);供水总量(0.121)
		大气质量	工业烟尘排放量(0.026);工业SO_2排放量(0.028);$PM_{2.5}$排放量(0.103)
	环境治理	环境美化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11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0.175);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0.045)
		环保投入	环境治理投资额(0.297)
增长成果	公共服务	基础设施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0.054);邮政局(0.078);医院数(0.061);体育场馆数(0.037);公共服务支出(0.112)
		交通服务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0.136);客运量(0.054)
	社会共享	文化事业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0.055);博物馆数量(0.093);文化馆数量(0.039)
		社会和谐	人均GDP(0.101);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0.092);人均地方财政支出(0.088)
增长形态	引进来	文化传播	剧场数增长率(0.246)
		区域合作	旅游外汇占外贸出口比重(0.263);利用外资占GDP比重(0.102)
	走出去	品牌影响	红色旅游景点关注度(0.205)
		宣传营销	社交媒体传播指数(0.184)
增长基础	文化保护	基因传承	红色文化关注度(0.185)
		保护体系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关注度指数(0.315)
	旅游资源	景区建设	5A级景区密度(0.293)
		产品开发	红色旅游线路关注度(0.207)

式中:HD(M_1, M_2)为红色旅游实际运行状态(M_1)和高质量最佳运行状态(M_2)之间的距离;x_{bi}、x_{ai}分别为城市i红色旅游发展的实际值b与其标准值a;K_i为权重。将失配度等级划分为匹配类型∈[0.0, 0.4]、过渡类型∈(0.4, 0.8]、高度失配∈(0.8, 1.0][16]。

1.4.2　定性比较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能够识别多种前因变量并发作用,还避免了多个前因变量引致的共线性问题,具体测算包括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计算公式如下[22]:

$$\text{Consistency}(X \leqslant Y) = \sum \min(x_i,\ y_i) / \sum x_i \tag{2}$$

$$\text{Coverage}(X \leqslant Y) = \sum \min(x_i,\ y_i) / \sum y_i \tag{3}$$

式中:X与Y分别为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集合;x_i、y_i分别为变量i分别隶属于组合X、Y。一般认为当单个变量的一致性高于0.85且覆盖率高于0.9,即认为结果变量的充要条件成立。此外,采用四值模糊集校准法作为变量的量化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

2.1.1　系统演化趋势　由图2可知,2006—2019年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介于0.186~0.301,整体可划分为3个阶段,即2006—2010年波动发展阶

表2 案例地概况

Tab. 2 Overview of the case

城市	红色经典景区	文旅部公布的红色旅游典型案例	5A级红色旅游景区（携程景区排名）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临沂市	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沂南县	沂蒙山旅游区(2)	18.51
长沙市	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沙洲红色旅游景区	花明楼景区(19)、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1)	17.53
湘潭市	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彭德怀故居和纪念馆	韶山	韶山旅游区(1)	28.70
石家庄市	西柏坡红色旅游系列景区、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西柏坡	西柏坡景区(24)	25.46
常熟市	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	沙家浜景区	沙家浜虞山尚湖旅游区(1)	17.94
嘉兴市	中共一大旧址	南湖旅游区	南湖旅游区(6)	26.70
六安市	新四军第四支队纪念馆、黄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	金寨县	–	29.35
龙岩市	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古田旅游区	古田旅游区(6)	21.52
吉安市	井冈山红色旅游系列景区、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吉安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心旧址	井冈山	井冈山风景旅游区(1)	51.41
赣州市	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赣州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于都县	共和国摇篮景区(2)	40.54
信阳市	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信阳市	–	14.58
安阳市	红旗渠、刘邓大军指挥部旧址	红旗渠	红旗渠太行大峡谷(1)	27.05
武汉市	红色旅游系列景区、辛亥革命系列景区	–	–	22.01
黄冈市	大别山红色旅游区、陈潭秋故居	陈潭秋故里	–	13.31
百色市	红七军军部旧址、红七军和红八军会师地旧址	百色市	百色起义纪念园景区(4)	49.99
广安市	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邓小平故里	邓小平故里旅游区(1)	37.04
遵义市	遵义会议纪念馆、红花岗区红军山烈士陵园、汇川区、桐梓县娄山关景区	–	–	60.47
延安市	延安革命纪念地系列景区	南泥湾	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3)	29.75

注：–表示无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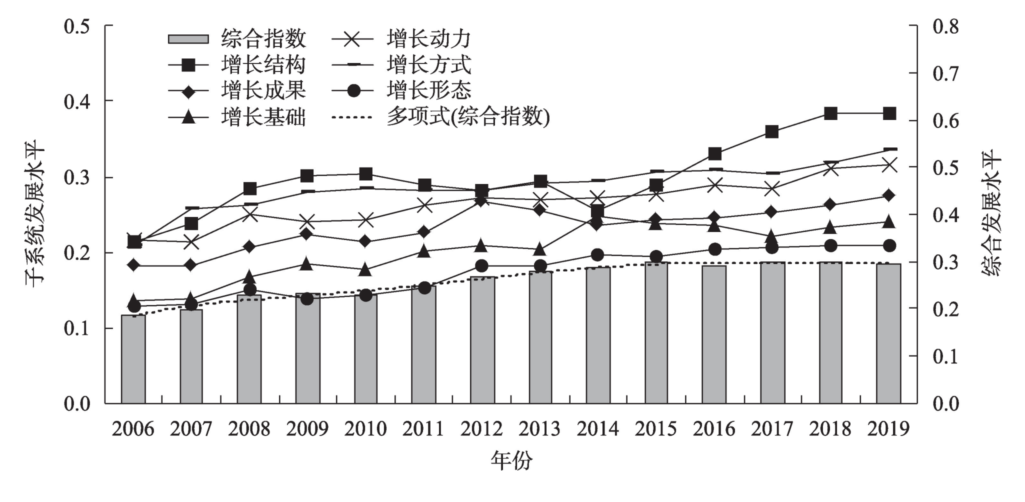


图2 红色旅游高质量及子系统发展水平

Fig. 2 High-quality of red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subsyste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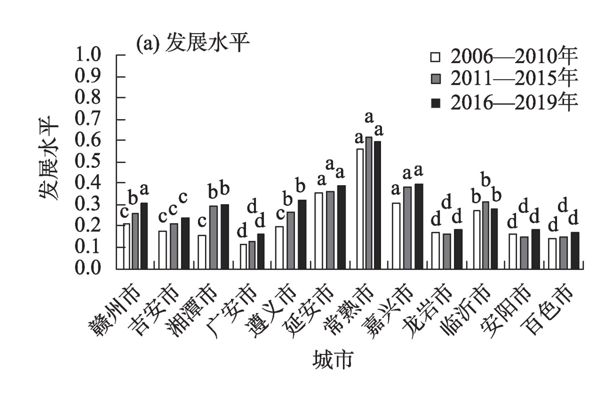
段，2011—2015年快速上升阶段，2016—2019年平缓上升阶段，与国家五年规划周期相吻合。阶段1是红色旅游由自发向自觉阶段过渡时期，随着红色旅游景区调价和陆续免费开放、消费群体由公费向自费转变、产品向“红色+”的复合型转变，红色旅游市场需求逐渐觉醒；阶段2为红色旅游深化过渡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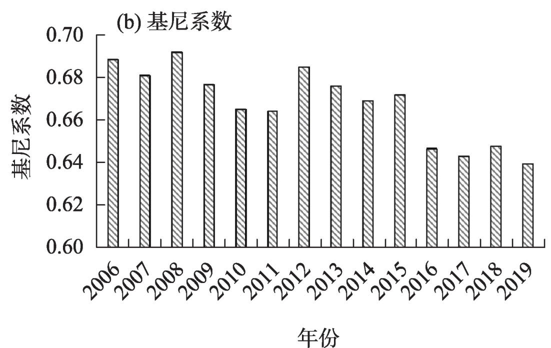
期，《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指明从业态融合、景区服务、从业人员等持续深化和巩固红色旅游发展成果，红色旅游规模上升显著；阶段3为红色旅游发展质量提升时期，《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提出红色旅游的内涵式和标准化发展，实现由数量规模化向提质升级方向转换，引致该时期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子系统演化趋势来看，增长动力呈现平稳上升趋势，且愈发重视红色旅游与关联业态融合创新。如延安市围绕红色资源开展了文创孵化、主题演艺、娱乐消费等多元延展型创新融合尝试，临沂市则创新性的树立了“研学城市”品牌形象。增长结构发展水平最高，但2011年后呈现波动下降态势，揭示出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内部结构矛盾及其与外部系统的不协调性问题，直到2016年全面发展时期增速才逐渐回暖。赣州市作为红色旅游共生协同发展的典型，以赣南苏区为核心，构建起了以瑞金为龙头，兴国、于都为重点的“1+2+N”协同格局，形成了整体大红色旅游市场。增长方式始终保持平缓上升态势，表明绿色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效应逐渐释放。如吉安市通过井冈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建设，成功入选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增长成果水平上升显著，表明地区红色旅游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不断释放。如嘉兴市重点激发南湖旅游区红色基地带动作用，打造了“没有围墙的江南水乡城市博物馆”，极大的提升了红色旅游发展的正外部性效应。增长形态水平始终处于低位，表明地区红色旅游发展的开放协作格局尚未成型。部分红色旅游城市谋求联盟发展，如常熟市围绕沙家浜景区，通过走出去开展了“共走红色路、同游江浙沪”，再通过引进来，举办全国红色旅游讲解大赛，推动地区之间互动发展。但整体来看，当前仍未形成明星化的红色旅游形象。增长基础水平攀升显著，随着红色旅游市场增量空间上升，红色旅游产品逐渐丰富。如湘潭市重点梳理了红色旅游关联的培训、文艺、影视、文创和文物等产业，形成了多业态共生的现代红色文化体系。但多数地区在红色资源开发中，存在产品、服务和业态趋同，缺少差异化和亮点，引致潜在市场需求向现实需求转化水平仍旧偏低。

2.1.2　*地区发展差异*　本研究运用基尼系数反馈地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差异，该值愈小表明地区发展差距愈平衡，反之则地区差距愈大。结果如图3可知，最大值为0.692，最小值为0.639，下降幅度较小，表明城市之间相对差异较大。借鉴陈景华等[22]研究，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划分为4种类型。延安市、常熟市、嘉兴市在观察期内始终处于领先类型；遵义市和赣州市发展较快，等级类型分别升迁为进步型和领先型，缘于其在推动新兴城镇化建设中不断提高与红色旅游发展的融合深度；吉安市、广安市、百色市、安阳市、龙岩市始终低于平均水平，未来存在较大追赶空间。

2.1.3　*系统失配度分析*　健康距离测算可知，领先地区除增长成果和增长形态处于失配类型外，其余子系统均处于过渡类型。进步地区仅在增长结构、增长基础处于过渡类型，而追赶型和落后型所有子系统均处于失配类型。可见，整体缺乏匹配类型，这也是红色旅游发展由“量”向“质”转化的关键；二级指标障碍度计算发现（表3），文化创意、市场需





注：a为领先型；b为进步型；c为追赶型；d为落后型。

图3　地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

Fig. 3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 red tourism

求、交通服务、文化事业、区域合作、产品开发是共性障碍因子，且多源自于外部发展环境系统。除去共同的障碍因子外，发现领先型在宣传营销上有待改善，进步型在体制机制和研学教育上亟待强化，追赶型在经济协调、产业集聚、城镇化协调方面存在不足，而落后型在保护体系上存在上升空间。说明当处于较低水平时，红色旅游高质量更多的是受到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内部因素制约，而发展水平愈高，则受到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外部环境影响，主导障碍因素呈现出由内部资源优势向外部环境协调转化的过程。

2.2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培育路径分析

前述分析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多案例地的定性比较分析，找寻推动地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性提升模式，并探索出各子系统在组合模式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典型案例地进行内容分析法，通过对个案中的关键因素进行辨析和逐级提炼，将组合模式的理论经验总结与典型案例的发展实践相结合，最终提炼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培育路径(图4)。

2.2.1 多案例视角的提升模式分析 通过以12个城市红色旅游高质量水平为因变量，六大子系统作为自变量，建构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模式。结果如图5所示，所有组合均符合一致性阈值要求，满足统计可靠性。

(1) 组合模式分析

领先型组合模式Y_1而言，增长结构、增长成果、增长形态和增长基础的同时提升必然引致高质量发展结果；进步型组合模式Y_2中，相对弱化了增长结构变量，成为领先型与其他类型区分的标识。增长结构发展水平不高，必然会制约红色旅游与其他系统的协调发展，难以产生长期稳定的共生利益群体；追赶型组合模式Y_3中，增长动力方面存在明显弱化，从而不利于红色文化旅游产品多元化开发能力，引致红色旅游产业链条的纵向延伸能力受到约束，压缩了市场需求弹性空间；落后型组合模式Y_4

表3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素

Tab. 3 Obstacles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类型	前十位障碍因素(障碍度/%)
领先型	宣传营销(5.33)、区域合作(5.18)、交通服务(4.51)、品牌影响(3.72)、体制机制(3.33)、市场需求(3.33)、文化事业(3.08)、文化创意(2.95)、基础设施(2.67)、产品开发(2.54)
进步型	体制机制(7.63)、文化创意(6.99)、研学教育(6.83)、市场需求(4.13)、产品开发(3.76)、区域合作(3.96)、交通服务(3.41)、文化事业(3.41)、品牌影响(2.83)、从业人员(2.67)
追赶型	经济协调(8.08)、产业集聚(7.02)、城镇化协调(6.84)、交通服务(5.24)、文化创意(4.35)、体制机制(4.32)、文化事业(4.21)、市场需求(4.16)、产品开发(4.04)、区域合作(3.19)
落后型	产品开发(10.29)、保护体系(8.23)、区域合作(7.46)、市场需求(5.58)、体制机制(4.39)、城镇化协调(4.38)、文化创意(4.28)、基础设施(4.27)、交通服务(4.27)、文化事业(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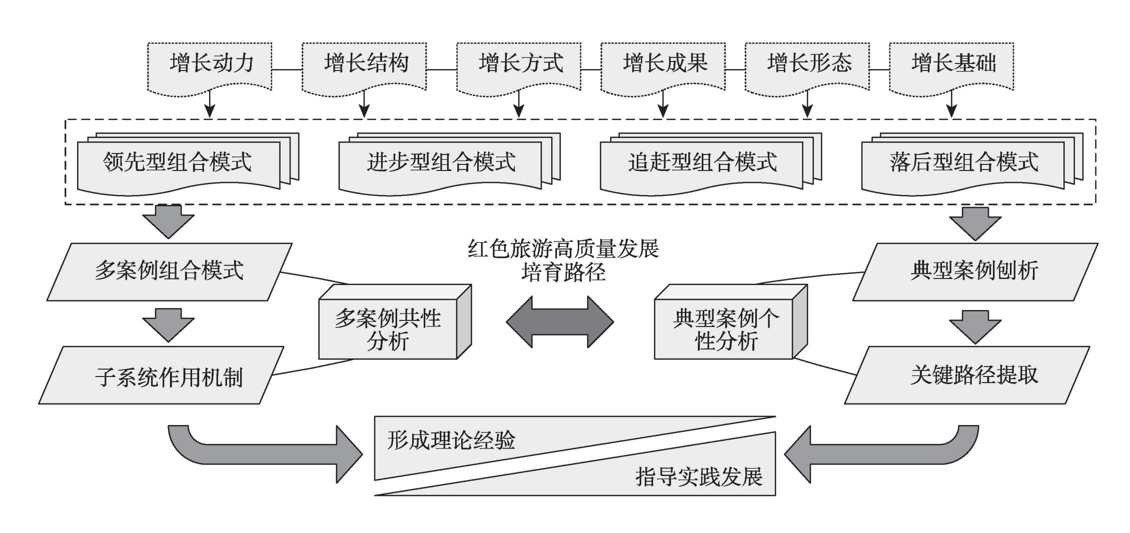


图4 培育路径分析框架

Fig. 4 Cultivation path analysis framework



注：RC、UC、*C*分别为原始覆盖度、唯一覆盖度、一致性；组合模式中“*”“~”分别为逻辑“和”“非”。

图5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模式

Fig. 5　Combination mod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中，增长形态出现明显弱化，该类地区“引进来”“走出去”方面存在短板，表明尚未形成地区明星化的红色文化旅游形象，导致旅游流规模较小。且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不高，在吸引外部资本流入、区域合作营销等后劲不足，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2）作用机制分析

增长动力作为核心因子，在发展初期重要性并未凸显，是进步型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仅2019年领先型增长动力作为基础变量得以显现，表明增长动力作用发挥需要特定条件支撑，是红色旅游发展趋于完善和成熟阶段的体现；增长结构在驱动进步型、追赶型和落后型发展过程中作用相对弱化，表明该类地区红色旅游共生群体尚未形成，是共生因子；增长方式通过隐性的交叉补偿路径能够产生积极的正外部性效应，但该效应发挥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是非敏感因子，表现在追赶型和落后型的第2个周期才逐渐凸显；增长形态在领先型中始终处于基础变量，而在进步型和追赶型的第3个周期显现，在落后型中则为不显著变量，表明增长形态在红色旅游起步初期具有导向作用，即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实施，对红色旅游目的地形成推拉效应，较高的开放增长形态必然引致良性拉力效应，反之会引致恶性外推效应，是敏感因子；增长成果在上述4种组合模式中均被视为共性核心条件，表明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激发了其正外部性效应发挥，有效扩大了红色旅游的公益效应，做到了市场发展与公益性的有效平衡，是外部性因子；增长基础在追赶型前2个周期和落后型初期较为显著，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力逐渐弱化，该类型地区借助后发优势在相对成熟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引导下，通过完善红色文物保护体系、旅游开发模式、

线路设计、市场需求等迅速实现规模化增长，成为支撑因子。

2.2.2 个案视角的关键路径分析

（1）样本选取与网络文本处理

首先，选取涵盖领先类型和等级升迁类型作为案例地，以“地市名+红色旅游”在百度、学术网站、知网、地方政府网站上进行交叉检索，筛选后共获取512篇网络文本；其次，通过2名研究者分别对网络文本进行逐句阅读并提取关键词；最后，2名研究者对其所提取的关键词进行交叉复核，以保证关键词提取的客观性(图6)。

（2）关键路径分析

第一，全方位扩大红色旅游的正外部性效应。一方面，以“旅游扶贫”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公益性与营利性”“文物保护”等关联密切，表明红色旅游发展中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平衡发展，通过其正外部性效益发挥促使地区红色旅游发展形成集聚效应，实现增长形态由“非均衡”向“包容共享”转变；另一方面，围绕“发展模式”为核心的“规划编制”“旅游项目”“康养旅游”等关联密切。表明红色旅游正外部性效应发挥，应将红色旅游融入地区大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中，全方位解锁“红色旅游+”发展模式，推出更多差异化产品。

第二，优化数字经济格局下的红色旅游共生环境。“数字化服务”关联的有“旅游企业培育”“部门协作”“机构改革”等。表明数字化布局已广泛涉猎红色旅游的基础设施、支撑平台、创新创意、治理能力、新兴业态，反映出通过数字化2次激活红色旅游消费市场，并催生出新的共生发展空间，以补足红色旅游市场“漏损”。具体而言，一是注重数字化优势，延伸红色旅游产生链条，与在线新经济模式相结合，推动红色旅游业态融合；二是培育一批具备创新意愿和能力的旅游企业，形成品牌化的标杆效应，作为推动红色旅游数字化发展的主体力量；三是转变发展理念，熟练运用数字化思维，强化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组织领导和数字化治理能力，为红色旅游发展提供支撑。

第三，激发红色研学的大众旅游市场需求。以“红色研学”为核心的“交流培训”“旅游形象”“红色教育”等关联密切。研学、培训是红色旅游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模式，是地区红色旅游“引进来”的主要客源市场，表明如何将研学市场拓展至大众旅游市场已成为红色旅游“走出去”的关键。具体而言，一是成立专业化的研学机构，将研学教育与地方特色文化有效融合，既传承了红色文化，又扩大了地区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影响力；二是开展红色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包括红色街区、红色小镇、演艺等，构筑地区红色旅游的品牌化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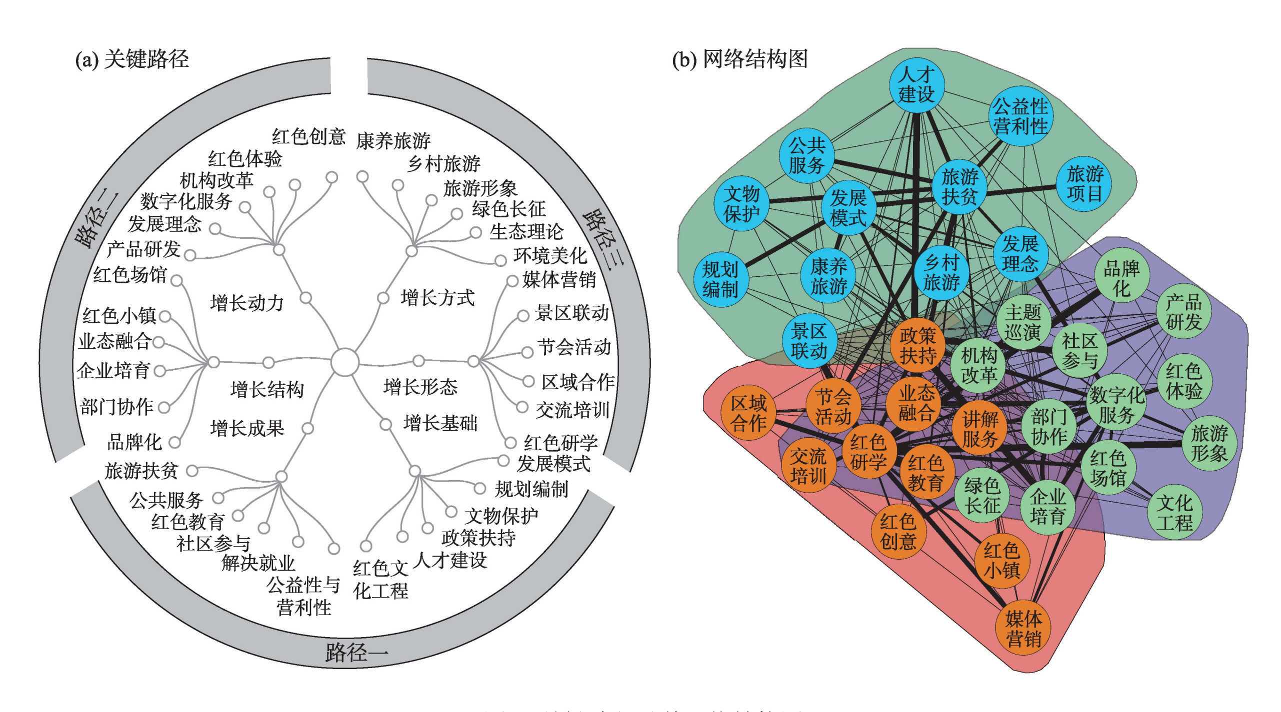


图6 关键路径及其网络结构图

Fig. 6 Critical path and network structure diagram

力；三是加强区域红色研学培训交流合作，形成明星化的地区红色文化旅游形象。

此外，政府扶持是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引导力量。“政府扶持”在上述3种关键词网络结构中均存在显著的关联。可以通过平衡政府、企业和社区之间的利益分配，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区多元参与的合作机制，理顺管理体制，发挥多主体协同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3 讨 论

以往研究多集中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要素、结构、体系、内涵和外延等理论性认知，但缺少构建与之相适用的量化评估体系，引致难以提炼出红色旅游高质量独特的发展机制和培育路径。本研究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归纳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六大系统，具体是由表征红色旅游发展动力的创新发展系统、检验红色旅游与社会经济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系统、解决红色旅游外部性与生态共生的绿色发展系统、反映区域内红色旅游内外联动性的开放系统、考察红色旅游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共享发展系统、体现红色旅游特色和发展基础的文旅资源系统所共同构成的复杂巨系统。

结合六大系统功能定位，在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创新发展驱动，完善好红色旅游的体验化和科技化，优化红色旅游的网络空间体验，形成红色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的新型消费业态。二是建立现代化红色旅游产业体系，形成与数字、生态、科教等融合共生发展。三是树立低碳发展理念，打造“红带绿”“绿促红”的低碳示范区，形成绿色低碳的红色旅游发展氛围。四是重塑红色旅游宣传推广体系，结合地区重大战略布局，强化区域合作和形象推广，让红色旅游真正“红”起来。五是强化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面向新时期涌现出的新思想和新需求，构建起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科学性的红色研学教育新体系。六是延伸红色旅游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挖掘出新的发展模式，摆脱原有资源开发的路径依赖，盘活红色文化资源。

4 结 论

（1）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城市之间存在差距。子系统发展而言，增长动力、增长结构和增长方式3个子系统上升水平尤为显著，而增长形态始终处于低位徘徊。

（2）城市间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存在极差化特征，等级升迁类型相对较少。系统失配度分析可知，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愈高，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影响愈大，其主导障碍因素呈现由内部资源优势向外部环境协调转化的过程。

（3）培育路径分析可知，增长动力是核心因子，增长结构是共生因子，增长方式是非敏感因子，增长形态是敏感因子，增长成果是外部性因子，增长基础是支撑因子。典型个案的内容分析法提炼出全方位扩大红色旅游的正外部性效应、优化数字经济格局下的红色旅游共生环境、激发红色研学的大众旅游市场需求共三大关键培育路径。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Carbone F.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War museums’ role in the post conflict tourism-peace nexu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2, 30(2-3): 565-583.

[2] Prayag G, Buda D M, Jordan E J. Mortality salience and meaning in life for residents visiting dark tourism sit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1, 29(9): 1508-1528.

[3] 张新成, 梁学成, 高楠, 等. 长征主题红色旅游资源关注度的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制分析[J]. 旅游科学, 2021, 35(3): 1-23. [Zhang Xincheng, Liang Xuecheng, Gao Nan, et al.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attention degree of Long-March-themed red tourism resources [J]. Tourism Science, 2021, 35(3): 1-23.]

[4] Fokin V I, Elts E E. The role of museums in Russia’s and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ies[J]. Rudn Journal of Russian History, 2019, 18 (4): 865-882.

[5] Lin C. Red tourism: Rethinking propaganda as a social space[J].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2015, 12(3): 328-346.

[6] 高楠, 张新成, 王琳艳. 中国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5): 1068-1089. [Gao Nan, Zhang Xincheng, Wang Linyan.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red tourism network attention [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5): 1068-1089.]

[7] 宋昌耀, 厉新建, 张琪. 红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J]. 旅游学刊, 2021, 36(6): 3-5. [Song Changyao, Li Xinjian, Zhang Qi.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 (6): 3-5.]

[8] 林宝民, 林德荣. “三新”引领下的红色旅游发展思路[J]. 旅游学刊, 2021, 36(6): 5-7. [Lin Baomin, Lin Derong. Th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ree news”[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6): 5-7.]

[9] 阎友兵, 欧阳旻.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以韶山市为例[J]. 旅游论坛, 2021, 14(6): 29-40. [Yan Youbing, Ouyang Min.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d tourism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Taking Shaoshan City as an example[J]. Tourism Forum, 2021, 14(6): 29-40.]

[10] 许春晓, 唐慧, 孟圆圆, 等. 湖南红色旅游资源的共生势能[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7): 1718-1733. [Xu Chunxiao, Tang Hui, Meng Yuanyuan, et al. Symbiosis potential energy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in Hunan[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7): 1718-1733.]

[11] 雷莹, 杨红. 红色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MATEL-ISM-MICMAC方法[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1, 37(6): 100-110. [Lei Ying, Yang Hong.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t attractions: Based on the DEMATEL-ISM-MICMAC method[J].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1, 37(6): 100-110.]

[12] 吴若山. 红色旅游发展的"破"与"立"[J]. 旅游学刊, 2021, 36(6): 1-3. [Wu Ruoshan. "Broken" and "Establish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6): 1-3.]

[13] 邓伟, 谭琳, 杨才, 等. 中国山地红色旅游资源类型、分布与高质量开发[J]. 山地学报, 2021, 39(2): 163-173. [Deng Wei, Tan Lin, Yang Cai, et al. Types, distribution and high-quality exploitation of Chinese mountain red tourism resources[J]. Mountain Research, 2021, 39(2): 163-173.]

[14] 王雄青, 胡长生. 文旅融合背景下红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江西的视角[J]. 企业经济, 2020, 39(11): 100-107. [Wang Xiongqing, Hu Changsheng.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red cultural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Jiangxi[J]. Enterprise Economy, 2020, 39(11): 100-107.]

[15] 阳国亮, 凌连新, 徐楠楠. 新时代背景下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研究——以广西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20(5): 151-157. [Yang Guoliang, Ling Lianxin, Xu Nannan. A study on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and rural tourismin the southwest ethnic regions under the new social background: Taking Guangxi as an example[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20(5): 151-157.]

[16] 张新成, 梁学成, 宋晓, 等. 黄河流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失配度时空格局及成因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12): 201-208. [Zhang Xincheng, Liang Xuecheng, Song Xiao, et al. Spatial pattern of the mismatch degree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4(12): 201-208.]

[17] 邵鹏, 王齐, 单英骥. 基于文本分析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11): 78-83. [Shao Peng, Wang Qi, Shan Yingji. Research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ased on text analysis[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4(11): 78-83.]

[18] 纪陈飞, 吴群. 基于政策量化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政策效率评价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 资源科学, 2015, 37(11): 2193-2201. [Ji Chenfei, Wu Qun. Evalu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city l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policy based on policy quantification in Nanjing City[J].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11): 2193-2201.]

[19] 邹亚锋, 李亚静, 袁志鸿. 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研究[J]. 干旱区地理, 2020, 43(6): 1612-1621. [Zou Yafeng, Li Yajing, Yuan Zhihong.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new urbanization level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in western China[J]. Arid Land Geography, 2020, 43(6): 1612-1621.]

[20] 李恒吉, 曲建升, 庞家幸, 等. 甘肃省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时空综合测度研究[J]. 干旱区地理, 2020, 43(6): 1622-1634. [Li Hengji, Qu Jiansheng, Pang Jiaxing, et al. Spatial-temporal synthetic measurement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economy-society-resource-environment system in Gansu Province[J]. Arid Land Geography, 2020, 43(6): 1622-1634.]

[21] 张新成, 高楠, 王琳艳. 我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多元系统协同水平时空演化及其作用机制分析[J]. 干旱区地理, 2022, 45(1): 298-309. [Zhang Xincheng, Gao Nan, Wang Linya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multisystem of rural tourism public service in China[J]. Arid Land Geography, 2022, 45(1): 298-309.]

[22] 陈景华, 陈姚, 陈敏敏.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12): 108-126. [Chen Jinghua, Chen Yao, Chen Minmin.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ynamic evolution of distribution[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20, 37(12): 108-126.]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A case of red tourism cities

ZHANG Xincheng[1], GAO Nan[1], WANG Linyan[2], LI Jinjing[1]

(1. Schoo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Journalism Arts,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31, Shanxi,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five concepts for development,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for red tourism is established that considers growth dynamics, structure, mode, outcome, form, and bas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ultiple red tourism cities and the network text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welve key red tourism cities in China. The cultivation path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were then identified by comparing several cas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overall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n the case cities is insufficient, but there are notabl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level of growth dynamics, structure, and mode in the six subsystems ar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2) In all case cities, at the start of the observation period,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s polarized, and the system mismatch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each type of development have different barriers, and the dominant barriers also show an internal shift. (3) The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in multiple cases demonstrates tha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s the result of six subsystems, of which growth momentum is the core factor, growth structure is the symbiotic factor, growth mode is the non-sensitive factor, growth form is the sensitive factor, growth outcome is the externality factor, and growth foundation is the supporting factor. (4) Red tourism's positive externality impact can be expanded in all aspects, its symbiotic environment may be optimized in a digital economy pattern, and research travel boosts the mass tourism consumer market. Through the five concepts for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six system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expand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ive concept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red tourism, elucidates the conceptual model, internal mechanism,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and endeavors to clarify the focus and direc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d tourism; high-quality; index system; cultivation path